

## 陈振声： 我国政治领导团队互相扶持无代际之分

何惜薇 报道  
hosb@sph.com.sg

副总理兼经济与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尚达曼今年和时任总理公署部长陈振声一起到瑞士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陈振声形容那是副总理尚达曼“带”着他去，并以自己在国际上的良好声誉做出安排，让他这位年轻部长有机会登上世界舞台。

目前担任贸工部长的陈振声昨天出席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政策研究所（IPS）配合成立30周年举办的论坛时，以这个亲身经历说明政治领导团队传承的重要。

这位普遍被视为总理接班人“领跑者”之一的第四代部长强调，本地领导团队代际其实并不分明，不能一刀切地把不同领袖定义为某一代领导团队的成员。

“第一代、第二代、第三、四、五代，这不是我们的领导模式，我们的领导模式有延续性，不论是政策或方针都有重叠。那是个这一代帮下一代的模式……大家共同在世界舞台上高举国家的旗帜。”

李显龙总理今年5月参加政府施政方针辩论时，曾形容第四代领导团队的成员有不同的技能和强项，他们正积极汲取各方面的经验，也正在学习如何取长补短、共同决策和承担后果。

补短、共同决策和承担后果。

陈振声昨天把团队里每个人的看法和风格不同，视为优势。“关键是什么时候都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内阁评估每项政策时，都会问自己：政策在短期和长期是否利国惠民？如果短期能为人民带来益处，长期却不能，我们还要落实政策吗？如果长期惠民，短期却不容易执行，我们要如何动员人民支持这项政策？”

他坦言，出现意见分歧时，团队要历经激烈的辩论才能达到共识，但大家都明白一旦做出集体决定后，就会一心一意地说服国人一起踏上征途。

他也说，部长们肩负的集体责任，正是一些部长为什么会针对不直接管辖的课题发言，或者不遗余力地协助解释政府立场。

### 国人不应为他人贴上特定标签

正如他不愿意为领导团队贴上代际标签，陈振声在超过一小时的对话会上，也多次提醒国人不能单凭个人的出身背景、肤色或学校等条件，把人们归类，或他们贴上某种标签。

“部长们不会因为入阁后，一夜之间就变成同声同气的整体；每个人都是拥有不同看法的个体，和任何人接触时，也应该以此为前提。我们要珍惜每个个体，协助每个人发挥所长。”

不赞成以一竹竿打翻全船人的同时，陈振声也不同意从单一的层面去讨论社会不平等问题。不平等问题近来备

受各界关注，但陈振声留意到大家都把焦点集中在“收入不平等”这个单一的面向。

“我们对收入不平等问题关注，不应该只是因为它确切存在，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能否让每一个人都充分地发挥潜能……我们是否在注意到每个人有不同强项的前提下，为他们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如果我们能够这么做，就是取得成功了。”

至于如何解决收入不平等等问题，除了强调社会流动，确保一代超越一代，并且在国家的层面上寄望“水涨船高”，陈振声强调表现好的人在涨潮时，应向陷入低潮的弱势群体伸出援手，“相互尊重而不是从单一的层面去评估他人”“希望别人如何对待自己，就以同样的方式对人”。

IPS 30周年大会报道 刊第20、21页

# 杨莉明： 设最低工资或导致失业等反效果

人力部长杨莉明说，我国选择通过就业入息补贴等计划帮助低收入国人，成功使他们在2012年至2017年，每年实质收入增长达4.2%，比全职就业居民人口中位收入增长3.4%高。

设定最低工资帮助弱势群体提高收入的做法，近来在舆论探讨如何解决社会不平等的对话中再次浮现。人力部长杨莉明说，最低工资反而可能造成失业和非法就业问题，新加坡选择通过就业入息补贴等计划帮助低收入国人，成功使他们的收入增长高于其他群体，也避免了最低工资制的弊端。

杨莉明昨天在政策研究所配合成立30周年举办的论坛上指出，数据显示收入处于最低20百分位的国人在2012年至2017年，每年实质收入增长达4.2%，相比之下，全职就业居民人口的中位收入在同时段则是增加3.4%。“这显示收入差距缩小了。”

此外，由于员工领取的额外补助有一部分存入公积金户头，这不仅能帮助他们增加退休储蓄，也可以用来购买组屋。杨莉明说，政府在上述五年期间拨出55亿元帮助了83万名低收入人民，其中37亿元存入员工公积金户头，这提高了低收入者的拥屋率。收入处于最低20%水平的国人当中，拥屋率高达八成。

英国、加拿大和日本等国家



人力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杨莉明（左起）在政策研究所举办的第一场论坛上强调，政府并非在意识形态上彻底否定最低工资等福利政策，而是很务实地考虑这些措施能否有效解决现有问题。论坛由政策研究所兼任高级研究员曼努（Manu Bhaskaran）主持，官委议员新跃社科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特斯拉博士是另一位主讲嘉宾。（邹福荣摄）

已推行最低工资，我国学术界与国会上也不时掀起有关最低工资的辩论，但政府一直以来都维持反对最低工资的立场。在杨莉明看来，一些国家落实最低工资后出现两个问题，有的雇主不愿以较高成本聘请员工，导致就业率下跌，若员工迫于生计，在雇主非法开出低于最低工资的条件后仍答应工作，权益反而遭剥削。

她说：“就业入息补贴计划为员工提供高达30%额外收入，与最低薪金一样达到了提高员工收入的效果。但两者关键的不同在于成本由政府而非雇主承担，因此不会造成失业或非法就业的问题。”

不过，主张推行最低工资的巡回大使许通美教授指出，日本、韩国、香港和台湾推行最低工资后并未出现杨莉明形容的问题，香港更是帮助了“成千上万

的香港人脱贫，让他们有尊严地生活”。杨莉明回应说，香港的情况并非全然乐观，有雇主在最低工资生效后辞退年轻员工选用年轻人，年轻人也产生既然工资一样，干脆选择轻松差事的观念。

她也指出，劳资政三方为清洁业、保安业和园艺业制定的渐进式薪金模式实际上犹如“有阶梯的最低工资”，员工提升技能、扩大职责范围或生产力提高时，便可以不断往上爬获得加薪，至今已帮助7万多人提高了他们的收入。

**学者：最低工资好坏参半 我国可微调细节再推出**

至于工资过低使得年老时没有足够养老金的人，政府也从2016年起推出乐龄补贴计划提供现金补贴。杨莉明透露，去年有15万2000名长者获得总额超过3

亿3300万元的补贴。

新跃社科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特斯拉博士认为，国际上证明最低工资好坏的证据参半，但他认为我国仍可在微调细节后制定一套最低工资机制。“在许多国家的劳动力市场里，雇主与雇员的地位并不平等，许多雇员不了解他们的权益，也难以集合力量提高谈判筹码，只能受制于人。最低工资可为他们提供一些保障。”

尽管政府至今仍反对推行最低工资，但杨莉明也在论坛上强调，政府并非在意识形态上彻底否定最低工资等福利政策，而是很务实地考虑这些措施能否有效解决问题。她举失业保险为例指出，失业保险不是“疯狂的想法”，未来若国人失业的可能性大大提高，推出失业保险由所有人共同分担风险或许将是务实的做法。

## 契连·乔治： 公民精神可助团结国民

体现互惠原则的公民精神能够促进国人之间的关系，是对分裂企图的最佳防御，更是一剂有效的“解毒剂”，让我们不会陷入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教授契连·乔治（Cherian George）在第三场论坛上提出上述观点，并将建立公民精神列为实现国家团结目标的方法之一。

他指出，公民精神在一些社会中是社会契约的一部分，如果新加坡人觉得这不切实际而且过于理想化，那是因为长期以来公民精神都不是我们公共讨论的一部分，但我们不该将它视为陌生的论调，因为公民精神差点就写进《信约》。

契连·乔治说：“去看看拉惹勒南的初稿……里面写的是‘我们会通过互相帮助来实现幸福与繁荣’。我觉得这比李光耀修订的版本更清楚地说明国家对我们的期望。”

他也指出，如果人们将他人的福祉视为美好生活或者美好社会的考量之一，那就是公民精神的体现。

**普杰立严正驳斥其节目 刻意凸显种族刻板印象**

契连·乔治举例说，如果多数信仰的领导和成员本能地捍卫受到攻击的少数信仰，或中产阶级父母愿意缴纳更高的个人所得税让自己的孩子在具备更多社会公义、更少贫困的更文明社会中成长时，那就是公民精神。

同一论坛的另一位主讲人，通讯及新闻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普杰立医生，则在答问时间驳斥了网络舆论对他



普杰立：我们采用的唯才是用制度成效不错，它也仍旧是确保理想结果能够实现的最佳途径，虽然这个制度确实会产生负面后果，但我们应该处理这些后果，而不是假设这个方法不起作用。（邹福荣摄）

主持的一个节目的批评。

亚洲新闻台最近播出的《不分阶级》节目，邀请了来自不同源流的学生上节目畅谈他们对阶级分化的看法。

有观众注意到上节目的两名马来族学生都来自普通（工艺）课程，而直通车课程、快捷课程学生都来自华族或者印族，因此指责这个节目刻意凸显出种族刻板印象。

普杰立严词驳斥了这个看法，并指出如果观众也收看了他参与制作的另一个节目《不分种族》，就会知道他反对种族刻板印象。

他说：“我们访问的、放到片子里面的人，都是愿意上节目分享故事，谈他们遇到的困难和经历的人……我们邀请上节目的是从事某个行业的人，或者是就读于某个课程的学生，你们看到的却是这个人的种族……你们真应该自省一下，自己是带着什么样的种族刻板印象来看节目。”



# 陈振声： 努力取得成就不应被指为精英主义者

陈振声表示，“我希望我们的社会不会鄙视成功人士，除非他们已不再关心社会，否则还有谁敢争取成功呢？这样的话，我们的社会能进步吗？”

经一番努力而取得成就的人不应被泛指为精英主义者，只要他们关心弱势群体，尽力回馈社会，就不宜给他们贴上这样的负面标签。

贸工部长陈振声昨天出席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政策研究所（IPS）30周年大会，并在总结对话会上发表以上观点。

他在谈论社会不平等课题时提及精英主义，并指出在我国体制中发挥潜能并取得成功的人，不应被称为精英主义者（elitist）。

他举例说，最近到英华自主学校有学生向他反映，因为被人取笑为精英主义者而感到不自在。

“我告诉他们，你读英华自主学校不代表就是精英主义者，因为你是努力得到好成绩才考入的。但如果你不关心或不帮助比你还不幸的人，那就恰恰是对精英主义者的定义。”

陈振声认为，不应把“反精英主义”（anti-elitism）与“反卓越表现”（anti-excellence）混为一谈。

“如果不关心社会，取得成功获得好处后就活在象牙塔中，那被称为精英主义者是没错的。但如果我在国家体制中有良好表现，并继续为家人以外的社会付出，那被他人统称为精英主义者算公平吗？”

陈振声也指出，当今国际上似乎有想贬低成功人士的普遍情



贸工部长陈振声（左二）昨天出席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政策研究所30周年大会，在总结对话会上与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媒体集团新闻中心总编辑韩咏梅（右一），以及《海峡时报》言论版主任蔡美芬（左一）谈论有关社会不平等课题。右二是主持对话会的新传媒主播陈美莲。（邻福梁摄）

绪，他认为国人须慎防抱持相同心态。

他说，为精英设定狭隘定义，给成功人士随意套上负面标签，与我国希望给予人人平等机会争取成功的理念不符。

“我希望我们的社会不会鄙视成功人士，除非他们已不再关心社会，否则还有谁敢争取成功呢？这样的话，我们的社会能进步吗？”

不过，陈振声坦言，我国的确存在抱有阶级意识的人，并指自己就曾因说话方式与人不同而遭排挤，但他鼓励国人不要因为遇上类似情况而感到挫败。

此外，陈振声也以逗趣的方式表述，国人不应戴有色眼镜看人。

他说，如果大会嘉宾在台上发言时英语中夹杂方言，众人的反应可能是“这个人真厉害，懂得转换语码（code switch）”。

## 不同背景军人有机会互动

陈振声忆述，当年在武装部队担任第二步兵营指挥官时，他的一名信号兵其实在外从事非法活动，贩卖盗版录像光碟（VCD）。

“他对部队非常忠心，他曾问我步兵营会几时进行任务测试（battalion proficiency test），因为他要向警方自首，会去坐牢，但他承诺会赶回来参与任务测试，和我一起‘chiong’（意指一起拼命）。”

陈振声说，他成长的环境让他认识了许多这样的“兄

弟”。

“我的士兵们曾告诉我，你不用担心，你到新加坡任何角落，我们的兄弟都会照应你。”

当对话嘉宾问陈振声是否还是他们的朋友时，他回答说“他们还是我的兄弟”，引起全场哄堂鼓掌。

——陈振声以亲身事例说明，军队中不同身份背景的军人都会有机会互动，甚至建立有如手足般的感情。

说……所以我们不能概括（说我国存有阶级意识的问题），但我们认为我们都可以更好地相互体谅与交流。”

## 李智陞：更多元且复杂 社会政策须适时调整

我国社会越来越多元化且复杂，政府须适时调整政策，照顾国人的生活需要，同时符合社会观念的发展现状。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兼国家发展部第二部长李智陞以及新加坡管理大学社会学教授郑宝莲，在第二场座谈会中探讨我国“形成中的社会认同及社会形态”（Emerging Forms of Social Identities and Social Formation）。

李智陞说，国人对社会多元化并不陌生。近年，我国社会多元程度越来越高，这包括家庭结构以及宗教信仰意识的改变。政府须适时调整政策，照顾国人的生活需要，同时符合社会观念的发展现状。

他说，除了跨国、跨族婚姻家庭、重组家庭、单亲、单身等家庭结构的增加，政府也关注到其他新型家庭结构的出现，包括祖孙隔代教养家庭、同居（同性）家庭等，因此必须在亲婚姻及亲核心家庭的大前提下，为新型家庭创造存在空间。

李智陞说，在社会认同与形态多元化的全球化时代，我国有必要强调一个广义的国家认同。这个认同将建筑在唯才是用、公正平等、国人凝聚力与互信等理念基础上。

郑宝莲谈到多元化家庭结构时说，所谓“正常家庭”其实是社会建构的观念，单一的家庭意识形态已经无法满足国人家庭经验的多元性。随着跨国、跨族婚姻家庭的增加，以“华

族、马来族、印度及其他种族”（CMIO）四大种族标签来划定我国族群，作为政策依归的思考模式，不足以应付全球化趋势下的社会发展，须要重新被检视。她希望国人更有自信，认可不同文化的多样纷呈，创造更具包容性的社会。

她说，单身家庭与单身者比率持续增加，我国须关注年轻单身男女在寻找伴侣的过程中面对的困难。

郑宝莲也为精神病患者、残障者，以及同性恋、双性恋与跨性别者（LGBT）发声。她认为必须扫除对这些人士的偏见，让他们有尊严地生活而不是隐形于社会中。

谈到贫富悬殊，郑宝莲说我国国小，使得悬殊现象更为明显，无可隐藏；国人关注贫富悬殊不仅因为财富的差距，而是中产阶级感觉自己被发展的进程落下。她提到一些本地学子已无法预见自己将比父母更有成就，因此陷入焦虑。我国需要更多相关研究，探讨贫富悬殊的方方面面。

在回复座谈会主席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少妍，关于刑事法典第377A节条文的存废问题时，李智陞说：“条文的废除与否对一部分人而言是对道德价值观的把关，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却是为了建造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社会。”他认为社会观念的改变需要时间，尽管条文存在，我国已经在向着一个更加包容及多元化的社会迈进。